

哈罗德·布鲁姆审美教育研究

赵翔, 王云*

齐齐哈尔大学外国语学院 黑龙江齐齐哈尔

【摘要】哈罗德·布鲁姆是当今世界颇具影响力的文学批评家,在其批评生涯后期将其毕生所学转投进入到文学审美教育当中。布鲁姆运用其围绕崇高美学思想所建立的审美批评打造的正典体系来应对在多元文化主义泛滥的年代所造成的“审美缺失”,并以此来实现基于文学经典对广大民众的审美教育,推广其审美阅读方法,促进读者重视个人内在审美体验,而非多元文化主义的批评,强调了主体在审美当中的作用,为“后理论时代”的文学研究提供一种思考与范式。

【关键词】哈罗德·布鲁姆; 审美教育; 审美批评

【收稿日期】2025 年 12 月 12 日

【出刊日期】2026 年 1 月 7 日

【DOI】10.12208/j.ssr.20260027

A study of Harold Bloom's aesthetic education

Xiang Zhao, Yun Wa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Qiqihar University, Qiqihar, Heilongjiang

【Abstract】Harold Bloom was a highly influential literary critic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In the later stages of his critical career, he redirected his lifelong scholarship toward the field of literary aesthetic education. To address the “aesthetic deficit” arising in an era of rampant multiculturalism, Bloom employed the canon system he established through his aesthetic criticism centered on the concept of the sublime. Through this approach, he sought to implement aesthetic education for the general public based on literary classics, promoting his method of aesthetic reading to encourage readers to prioritize personal inner aesthetic experience over multicultural criticism. By emphasizing the role of the subject in aesthetic criticism, Bloom provided a framework and paradigm for literary criticism in the post-theory era.

【Keywords】Harold Bloom; Aesthetic education; Aesthetic criticism

文学是审美教育的载体,而审美教育则是文学生命的延续,没有文学作品,人类语言的审美将无法实践,而没有审美教育,伟大的文学作品则将有可能被遗忘。所以文学与审美教育的辩证关系实则为文艺学对语言文学发展的助力。身为美国学院派文学研究的代表人物,哈罗德·布鲁姆的学术侧重与彼时主流学院派日趋多元化的学术研究方向大不相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国批评界爆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文化战争”,在多元文化主义思潮的冲击下,强调文学文本审美价值与语言特性的传统批评方法一度被边缘化^[1],取而代之的是以多元文化主义批评为代表的社会学与文化学批评实践对文学批评研究领域的大规模介入与再阐释。布鲁姆将此类批评者斥为“憎恨学派”(School of

Resentment),认为他们实为业余的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者,并指出“文学专业领域里的多元文化主义研究消解了文学批评自身”^{[2][51]}。在大学文学院的学院派所做的文学批评研究中更是逐渐开始淡化“审美”。与此同时,学院派传统学者主张重视经典文学,重塑文化的价值准则^{[3][27]}。布鲁姆的文学批评思想在这期间趋于审美导向,倡导用“审美”的鉴赏式研究去对抗趋向多元文化主义的文学研究,提出了围绕于崇高美学的审美批评思想以及围绕文学经典的正典体系,并将其审美思想与正典体系带入到审美教育研究当中。

1 围绕崇高美学的审美批评

布鲁姆的审美批评当中围绕的核心便是以“崇高”为标准的审美参照。在《西方正典》(The Western Canon,

作者简介:赵翔(2000-)男,硕士,研究方向:西方文论;

*通讯作者:王云(1972-)女,博士,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西方文论。

1994)一书的开篇,布鲁姆便强调其所选的纳入《西方正典》中的作家依照的理由是他们的崇高性和代表性^{[4]2}。而在布鲁姆《西方正典》之后的《天才:创造性心灵的一百位典范》(*Genius: a Mosaic of One Hundred Exemplary Creative Minds*, 2002)一书当中,更为系统地阐述了其批评思想体系当中的崇高。布鲁姆在《天才》中首先借鉴了古罗马时期修辞学家朗吉努斯(Longinus, 约213年—273年)对于崇高的论述,并且试图从古代西方诸多有关修辞与文学的研究来从审美角度界定文学经典作品以及文学经典作家的特征。布鲁姆论述:“古代批评家朗吉努斯认为文学天才具有‘崇高性’,天才的写作就是把力量从作者传递给读者。在受到真正的崇高品质影响之后,人的心灵会得到提升,一直上升到豪情的高度,心中充满欣喜和自得,仿佛自己也创造了那个刚刚听闻的事情”^{[5]3}。据此可以阐释,“崇高”在布鲁姆的审美研究体系中主要体现在经典作品作家的心灵感受刺激与作品的读者感受刺激两个维度。其所引发的审美阐述,表现为读者在精神维度得以提升后所体验到的心灵愉悦。在布鲁姆看来,唯有那些能够接受、表达并传递此种崇高力量的作家,方可被视作天才;而他们的作品,也正因承载并传达了这种崇高体验,才能够跻身经典之列。

崇高在美学中的重要性也促使其成为了布鲁姆新审美批评的重要参照标准。在《影响的剖析》(*The Anatomy of Influence*, 2011)一书中,布鲁姆自嘲“冒牌朗吉努斯”(Pseudo-Longinus),再度对审美研究进行了阐释:“虽说崇高这个词如今不再走俏,但是今天我们已经离不开《论崇高》(*Peri Hypsous*)这本书了。审美这个概念的境遇也一样,王尔德将其普及化,随后佩特又想恢复它古希腊词源中‘有洞察力’的含义,但如今也同样受冷遇”^{[6]19}。这反映了布鲁姆对于自己后期批评理论的基本特征概括,即尊奉崇高性为文学经典的最高美学标准,认为审美情感和智慧认知是作者和读者都应该具备的心智能力,契合于《天才》这一书名的“天才”二字,“崇高性”成为了辨识天才和经典的核心观念。

回溯布鲁姆文学批评理论所强调的众多关键词,总体上却可以围绕一个本质所展开,在布鲁姆看来,即是文学中存在一个单一的、恒久不变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本质——审美,具而言之,它就是一种“混合力”,包括“娴熟的形象语言、原创性、认知能力、知识以及丰富的词汇”^{[4]24}。布鲁姆坚信,审美是界定文学本体、功能与演进的唯一核心。文学经典的本质即是面向读

者与文学批评家阅读与批评中审美价值的生成与体现,而进行审美阅读的意义则在于通过纯粹的审美体验来实现自我的存在与完善,这一过程必须保持单纯的审美鉴赏,这意味着审美批评是一种鉴赏式的阅读体验,对经典文学的直接切入并不是研究目的,而是审视或者是鉴赏其中的美学之维,并实现经典作家创作经典文学向读者传递的精神刺激,由此得以推论审美批评的目标直指经典文学。

基于崇高的审美批评中强调读者应当具有审美自主性,《西方正典》中论述该特性为读者所必须:“审美批评使我们回到文学想象的自主性上去,回到孤独的心灵中去,于是读者不再是社会的一员,而是作为深层的自我,作为我们终极的内在性”^{[4]8}。其理论内涵在于将文学作为纯粹审美体验的载体,强调文学的本质在于其独立的美学价值,而非社会功能,主张回归文学的语言和想象本质。

2 审美批评下的正典体系

文学经典当中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即是“何谓经典?”关系着审美教育的基础,布鲁姆基于崇高所建构的审美批评回答了这个问题,并确立布鲁姆视域当中的正典体系。在前文中“多元文化主义”对文学批评的渗透,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在经典作品的边缘化解构成为学术潮流的背景下,“新审美主义”作为新兴理论思潮开始兴起。该思潮明确回应新历史主义、文化研究等以社会历史或政治分析为核心取向的批评范式,其核心主张是回归文学作品本身,强调作品的审美价值与独特性,聚焦于文本内部的语言、形式建构及美学效果并反对将文学作品简化为多元文化的镜像式反映,主张以审美体验为核心,深入发掘并阐释作品自身的美学意涵。布鲁姆的新审美批评的核心思想建构于以一种基于对文学作品审美价值考量为出发点的鉴赏式批评^[7],比起“批评”实践,其更加侧重“阅读”或“品读”实践。这也是为什么从布鲁姆的理论观念来看,他与唯美主义之间是一种继承和发展关系^{[6]88}。

基于这种鉴赏式审美批评,布鲁姆完成了其心目中的正典体系建构,《西方正典》导向其批评生涯的最后一个阶段——正典捍卫即重构和捍卫西方文学经典。《西方正典》所建立的正典体系围绕着文学史上的经典文学作家展开,而这些作家则是围绕着英语文学史上的巨匠威廉·莎士比亚所展开,莎士比亚置于这个正典体系的中心,放在与几乎所有其他作家的关联中进行审视,因为对布鲁姆而言,是莎氏与经典一起塑造了我们,没有莎士比亚,我们就无法认知自我。基于这样

的正典体系,完成了布鲁姆审美教育的落点基石,即以传统文学中的那些实现了布鲁姆批评理论中“六个修正比”(Six Revisionary Ratios)超越先驱的伟大作家,以及基于这些伟大作家产生的“影响”而再度尝试对其超越的“迟来者”作家。他们的文学创造是真正意义上契合于鉴赏式审美批评所关切的那种对于读者实现心灵上刺激。而这来自于布鲁姆文学批评生涯前期“影响诗学”的修正比,也成为了布鲁姆在构建审美批评时对文学经典界定审视的批评操作范式。

布鲁姆的正典体系认为文学经典的合法性源于其超越历史、道德和政治的纯粹美学价值。经典文本通过“陌生化”语言打破常规认知,经典作家需以“强者诗人”姿态挑战传统,最终留存的经典是“幸存者的名单”,其存续依赖于文本间的美学竞争而非社会权力关系,经典作品通过引发“认知焦虑”而非舒缓焦虑,使读者直面死亡与遗忘的终极困境。

3 正典体系下的审美教育

学界对哈罗德·布鲁姆批评生涯的最后一个阶段称之为“正典”捍卫,正典一词在表达文学经典外,还表达了“准则”的含义,表明有效的文学审美教育,必须立足于文本本身,以“审美”作为甄别与阐释经典的根本原则,并以文学经典为媒介来达成其教育宗旨。因此,研究布鲁姆的审美教育观是其文学经典研究的延伸。

围绕正典体系布鲁姆撰写了一系列审美教育新作,诸如《如何读?为什么读?》(*How to Read and Why*, 2000)、《诗人与诗歌》(*Poets and Poems*, 2005)以及《小说家与小说》(*Novelists and Novels*, 2005)等。基于此,布鲁姆研究转向对大众文学阅读的审美教育。这一转向的内在动因,正是他试图通过倡导文学阅读,来介入并塑造普通公众的精神世界。对于布鲁姆这样的文学批评家转投审美教育,有学者称他是“国民教育家”^[8]。在此阶段,布鲁姆致力维护文学传统与文学精神,立足于经典的正典体系教育,是布鲁姆尝试将学院派中的审美带往大众日常阅读的伟大尝试。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中论及经典阅读、文学批评的目的和功用之时,将此论述为一种非功利化的自我实现^{[4]24}。文学的审美教育实现了心灵的救赎,伟大作品中的人物特质凝结了人类的传统与人类的意志,审美阅读的目的在于去直面伟大的作品,这刺激着读者的心灵感受。

文学历来被视作“人学”,其核心意义在于对读者的治愈与塑造。布鲁姆的审美教育根本指向是人阅读后获得的一种能力——回到孤独的心灵中去。在布

鲁姆看来,文学经典的根本意义在于彰显创作者的主体性,并以此让读者通过审美阅读能够与经典文本展开深刻的思想对话,感受自身内在情感的回应,勇于直面人生的变数。与此同时,审美教育同样以“人的自我存在实现与完善”为根本宗旨,它将以读者阅读中实现的全面发展与人格完整作为最高理想,充分肯定审美所具有的以人为核心的意义。布鲁姆的审美教育高度重视其人文属性,“非功利”审美同时也契合了黑格尔的:“审美带有令人解放的性质,它让对象保持它的自由和无限,不把它违有利于有限需要和意图的工具而起占有欲和加以利用。”^{[10]147}文学经典的价值在于引导读者重构坚实的自我认同。这一过程通过与经典对话展开,使个体能够回归内在自我,理性面对生命孤独,并最终跨越自我局限,臻于自由之境。与之相呼应,审美教育的深层功能,正是为了弥补人生固有的缺憾;它帮助人超越生理与现实的桎梏,实现心灵的真正自由,将生存本身升华为一种艺术。

最终,布鲁姆这历经接近半个世纪的文学批评“旅途”完成的审美教育成为了当下对于文学传统保护捍卫的重要支柱,在多元文主义泛滥于学院派批评的时代,哈罗德·布鲁姆审美教育背道而驰,走出了自己的天地,强调“体验式地阅读”文学经典,读者应当是获取“阅读”的体验而非“说教”的体验,阅读中获得的是一种自我的增长,而不是多元文化主义批评在批评实践中获得的对其来源理论的“满足”。审美教育的意义始终在于为了“自我”而服务,文学读者的“自我”所经历的孤独、死亡、痛苦等诸多情感碰撞,同其所阅读的文学作品产生共振与反应,布鲁姆对此论述为:“西方经典的全部意义在于使人善用自己的孤独。”^{[4]24}并以此完成读者与作者基于审美实现的“对话”。这也是布鲁姆审美批评当中的一个重要特质——审美自主性,这一性质强调文学的非功利性,即文学价值蕴藏于作品艺术性当中,作家天才的体现以及不应被外部因素所干扰而存在于心灵中的审美体验的独特性。布鲁姆评价其推介阅读的审美教育形式为:“我转向自己的书单,希望文学幸存者们从中找到一些作者的书是他们从未谋面的,并且得到只有文学经典才能提供的回报。”^{[4]468}基于阅读的审美教育以及审美的自主性之外,布鲁姆还强调其审美教育中的阅读时应当与其审美批评的特质契合,布鲁姆的审美批评强调一种非功利化的审美导向批评,这使得其审美教育中的阅读观也强调:“阅读侧重于‘体验’,而非‘接受’。”^{[9]14}布鲁姆的阅读理论,其要旨不在于指导读

者剖析经典的成因,而在于召唤一种沉浸于文本本身的阅读状态。他构想中的理想读者,能够超越现实干扰,在孤独中与经典进行内在的深度交流。这种孤独是一种积极的自省,它为个体提供了与伟大灵魂共鸣、玄思诗性智慧的空间。布鲁姆进一步指出,此状态是实现“超越”与“自由”的必由之路,是阅读的本体性价值所在。

“审美教育”构成布鲁姆文学经典观与审美批评的共同枢纽。在他看来,审美教育介入经典的阅读,在于作品“崇高”特质所引发的审美效果,这直接决定了其经典地位的确立。而这种崇高效果的源泉,被完全归结为作者内在自我的创造性想象力,以及其在前人杰作的竞争中所实现的超越。布鲁姆认为,文学本质上是对人性的探索,其意义在于对人的“情感”进行抚慰和对“精神”进行塑造。布鲁姆的“审美教育”核心在于“成就个体”“塑造人格”和“培养人文素养”。这种从崇高美学延伸到审美批评,再到正典体系对经典文学的遴选最终以“非功利化”阅读的审美教育形式推介,正是阐释了文学与审美教育辩证关系的递进系统,对当下的语文教育提供了一种思考与操作范式。

参考文献

- [1] 江宁康.文学经典的传承与论争——评哈罗德·布鲁姆的《西方正典》与美国新审美批评[J].文艺研究,2007,(05):130-138.
- [2] 罗杰鸮.本土化视野下的“耶鲁学派”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
- [3] E. Dean Kolbas. Critical Theory and The Literary Canon[M]. Oxford: Westview Press,2001.
- [4] [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M].江宁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 [5] Harold Bloom. Genius[M]. New York: Warner Books, 2002.
- [6] [美]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剖析[M].金雯.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
- [7] 沈兴刚.哈罗德·布鲁姆晚期鉴赏式批评与审美回归[J].外国语言与文化,2023,7(04):1-12.
- [8] 曾洪伟.国家认同与人文涵养:试论哈罗德·布鲁姆的文学-国民教育[J].外国语文研究,2019,5(03):26-35.
- [9] [美]哈罗德·布鲁姆.如何读,为什么读[M].黄灿然.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 [10] [德]黑格尔.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147.

版权声明: ©2026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